

1 9 9 8

# 韓國學論文集

第 七 輯

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編

新 華 出 版 社

1 9 9 8

# 韩国学论文集

第七辑

北京大学百年华诞暨明知大学五十周年校庆专号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

新华出版社

1039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国学论文集 第7辑/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9  
ISBN 7-5011-4186-X

I. 韩… II. 北… III. 朝鲜-研究-文集 IV. K31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4113 号

##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丛书 由泉财团支援刊行

韩国学论文集

第七辑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光华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23.75 印张 55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一版 199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ISBN 7-5011-4186-X/Z·534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中韩历史上的文化交流 .....	白 锐 (1)
关于战争体验的小说形象化问题研究	
——以素材特征为中心 .....	李龙男 (14)
汉字的起源与东夷族 .....	陈泰夏 (22)
论韩国语的中原底层词和中古汉字词 .....	赵 杰 (32)
肖红和姜敬爱的小说创作比较 .....	何镇华 (39)
金泽荣文学中的中国文人思想考察 .....	宋天镐 (49)
《边城》与《黑山岛》的比较研究	
——以成长小说观点为中心 .....	刘丽雅 (62)
自主性与旧韩末近代化改革述论 .....	宋成有 (70)
韩国新闻报刊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意识 .....	郑保勤 (81)
韩中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与儒教思想的影响 .....	沈义燮 (93)
“均富”观念对中韩现代化的影响 .....	尹保云 (101)
韩国开发文化与环境形态	
——新的都市环境和社区共同体建筑的设计和发展 .....	朴赞茂 (107)
韩国工人的意识与劳资关系的特征 .....	李愚贤 (121)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韩中法文化的抵触 .....	金明基 (135)
从韩中行政程序法的制定看韩中行政程序法的异同 .....	金光洙 (144)
韩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与课题 .....	金淑子 (152)
韩国青少年不良行为的现状及其对策	
——与产业化带来的经济、文化环境变化的关系 .....	李基宪 (160)
韩国与中国人间像教育比较 .....	李范国 (171)
韩国传统儿童游戏文化的现代性考察与现代儿童传统教育 .....	金宣英 (179)
韩国青少年的饮食行为及其态度 .....	赵雅美 (189)
韩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对传统服饰向现代服饰转变的考察 .....	全良珍 (196)
韩国服饰的基本结构和传统款式 .....	赵孝顺 (206)
元晓生平小考 .....	何劲松 (213)
论朱子与奇高峰哲学思想的关系 .....	张立文 (223)
略论李退溪对朱子学的发展 .....	步近智 (235)
李退溪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 .....	葛荣晋 (242)

朝鲜湖洛辩论中知觉论的意义

——儒教的道德实践与知识问题 .....	文锡胤 (259)
中韩阳明学比较 .....	李甦平 (266)
四、五世纪日朝关系的若干问题 .....	沈仁安 (273)
试论苏轼的高丽观 .....	刘素琴 (282)
高丽与明之间的贡马问题 .....	金渭显 (289)
高丽后期性理学者对元朝的认识 .....	申千湜 (296)
恭愍王后期明高丽关系与明蒙战局 .....	李新峰 (306)
朝鲜佐领考 .....	徐 凯 (313)
简论《燕行录》与清代中朝文化交流 .....	王政尧 赫晓琳 (320)
甲午驻朝清军与朝鲜政府关系考实 .....	徐万民 王生怀 (328)
关于旅满朝鲜人的归化问题 .....	洪钟秘 (336)
中国馆藏朝鲜时代官箴书琐谈 .....	张希清 (343)
十九世纪初朝鲜活字和书籍研究 .....	玄英娥 (348)
韩国文献情报学研究者引用的汉语文献 .....	金容成 (355)
编后附言 .....	徐 凯 (369)

# 中韩历史上的文化交流

白 锐\*

韩国是我国的近邻，历史上相互的交流，上下延伸几千年，两国的文化交流从深度与广度来分析，均是任何国家不可比拟的。有史可记载的两国文化来往，对两国互相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两国历史交往中，汉文化起了连结和纽带的作用，从而使两国人民无论在政治、历史、哲学、宗教、文化艺术，或者其它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相似又相互补充的作用，这在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中，中韩两国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笔者不可能将这一宏伟而博大的历史交往与史实用简短的篇幅加以详述，只能就其主要脉络作一大体的勾划，即使如此，恐亦达不到问题的中核。中韩文化交流上的问题，乃至被人们所关注的汉字文化圈的问题，在研究上系一项大工程。这一课题的研究，无疑对我国的历史文化和我国周边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不仅如此，它对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也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缘由文化上的相亲相近，进而推动理解上的近似甚至一致，这是屡见不鲜的。笔者有幸作为韩国国际交流财团访韩研究的一员，于1996年访问了韩国，通过这一研究工作，更从感性和理性上加深了如上的理解。现拟就如下若干问题论述：

## 一、关于儒学的交流

谈到中韩两国的历史文化交往，绝不能离开儒、释、道在亚州地区的传播与相应国家对其的接纳与融合。中国的文化结构自然不是儒家一家，即使在久远的时期，先秦儒家思想也不是占了思想理念上的绝对地位，继孔子到孟子时始将儒学系统化、理论化，而法家思想为代表的诸家学说与理论仍占有相当的地位。但应该看到的是孔子的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精神，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在汉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儒家就是从孔子发端，到孟子扩大，宋儒综合，明清再发展，这一总的过程进而成为汉文化的代表。那么，孔子作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有影响。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特别在东亚，儒家传统思想非常普遍，并且深入人心、深入生活，成为人生和处世哲学的主要依据，又成为形成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种思想体系或者说一种学说、政治观点导入外国是很难以明确的时代划分的。那

\* 白锐系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么, 儒学从何时开始进入韩国的, 中、韩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我们是否可以说, 儒学是与汉文化(包括汉字)一起进入的, 这里还有一个接触、融纳、吸收、消化、再创造发展的长期过程。从地缘关系来说, 首先进入高句丽, 这是没问题的, 因为中原地区陆路直接接壤高句丽。历史上高句丽疆域设立过汉四郡(汉武帝时, 公元前 108 年 - 公元 313 年), 历时 400 年。这时无疑传入许多汉文化的要素, 而汉武帝时, 他在位 54 年, 人才辈出, 诸如, 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探险家张骞、大经学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军事家卫青和霍去病, 而武帝时作了两件划时代的大事: 一、废百家独尊儒术; 二、开辟中西交通。那么, 在这一政治、经济发展的势头下, 汉族进一步形成, 汉文化进一步成熟, 自然对周边国家所给予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汉四郡的原址(如乐浪郡)出土了许许多多的文物, 清楚地表明汉文化在这一个时期已经是深入到朝鲜半岛去, 而王仁(可能是百济人)携论语、千字文传授给日本, 也证明当时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普及情况。这样说, 是不是汉文化传入始于汉代呢? 当然不是这样, 它可以上溯到更早时期。箕子入朝鲜在《三国志秽传》记载有“箕子既适朝鲜, 以八条之教以教之, 无门户之闭, 而民不为盗”的八条, 表明朝鲜已有成文法, 进入文明程度颇高的社会。虽然国内外一些学者否认箕子朝鲜之说, 但也只是推论, 并无确凿的史料根据, 如果八条是可信的, 则中韩两国的文化接触的开始, 上线要定在商末周初, 即公元前 3000 年左右。根据韩国《三国史记》记载: 高句丽国初(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 37 年)已经用汉文修史, 名曰《留记》, 上层人士用汉文作诗, 如《箜篌引》: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坠河而死, 当奈公何

这是在中国脍炙人口的作品, 据考据当作于汉四郡之后。高句丽第二世琉璃王为思念王妃曾作诗《黄鸟歌》:

翩翩黄鸟, 雌雄相依, 念我之独, 谁其与归

这也是有力的证据。

与此稍后, 高句丽于 372 年设立太学, 教授儒家经典。此后除国家教育机关以外, 在地方设立了“庠堂”。《旧唐书》记载: “子弟未婚之前, 尽夜于此读书学射”。其书有: 《史记》、《汉书》、《三国志》、《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文选》。可见汉文化在高句丽的通行与普及。

百济(234 - 285 年)是确立王权时期, 它接受汉文化晚于高句丽, 由于地政关系, 它又从高句丽和南中国吸收了东进文化, 从而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同时又将其传入日本。

新罗接受外来文化较高句丽、百济晚一些。但到了新罗, 儒学在那里可以说是发展到极盛时期, 换言之, 中韩文化交流在新罗时期达到空前未有的阶段。

### (一) 唐代儒学在新罗的传播

#### (1) 唐代儒学东传的背景

在海东三国中, 儒学、经学渐次东传, 继传至高句丽、百济之后又传到新罗。在隋唐之际, 新罗与前二国相比, 却成为后来者居上。唐初, 百济、高句丽相继灭亡, 新罗统一了三国, 由于新罗在历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 而且同唐朝的关系十分密切, 交往甚多, 因此, 儒学在新罗传播得最广泛, 影响最为深远, 而且与历代相比颇具代表性。据史书记载, 中国前秦统一北方后, 新罗王就遣使(381 年, 新罗王奈勿尼师今 26 年)卫头

来到前秦贡献方物。前秦王饶有兴趣地问到海东古今之事，并询问使者说：“卿言海东之事与古不同，何耶？”卫头则回答说：“犹中国时代之变革，名号改易，今焉得同？”由此可见，新罗使臣虽是第一次来华，但对中国历史情况实不陌生。

至隋朝海东之间竞争加剧，在遭到高句丽、百济联合攻略时，新罗处于劣势，于是提请外援，这就加深了同隋朝的政治关系。唐朝成立后，新罗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并经常派使者来往，唐加授新罗各种官爵名号。后来，新罗与高句丽、百济加剧了竞争与矛盾，最终新罗统一了半岛，由于新唐联合战斗结下友谊，因此，相互建立了特殊的友好和亲善关系。这就为今后双方友好往来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 (2) 儒学在新罗的传播

在唐与新罗日益盛行的文化交流中，儒家学说在新罗得以广泛传播。这在韩国儒学的传播与发展史上成为一个重要时期。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公元前 515 - 479 年），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相信天命，崇尚“礼乐”和“仁义”。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在伦理上则以“三纲五常”与忠孝作为道德规范。汉代董仲舒又把儒家思想神学化，提出“天人相应”说，宣扬君权神授，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因而，汉武帝罢黜百家，儒学获得独尊的地位，成为中国封建阶级统治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对“为政修身，齐国治家”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在新罗也受到王公士庶的特别崇尚和喜爱。

这里，我们举出新罗花郎道为例说明。花郎道，是由新罗贵族子弟，自然也包括一些庶民子弟，甚至僧徒在内组成的，它系一种政治修炼的组织，上下曾延续一个世纪。他们讲授的德育课程有“五常”，即仁、义、理、智、信，表示父义，母慈，弟恭，子孝。还有“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此外，德育课目中还有道教“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佛教“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总括来讲，其教育内容是：1、相磨以道义，2、相悦歌乐，3、游娱山水。花郎道实际上是全国性的政治团体，它对新罗的统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它是新罗统一的核心力量。而新罗花郎道的指导思想，应看作是韩国固有思想与三教的融合，从而形成韩国的独特思想，某种意义上讲，这也代表了韩国的精神。对此，崔致远在鸾郎碑序中曰：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内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指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

正是这样，花郎道经过严格的教育和修炼，发扬集体精神，贤佐忠臣，培养良将勇卒，而达到治理国家需要的人才。在新罗统一中，立下不朽功勋的历史名将金庾信本人也是花郎道出身。可见儒教在新罗不仅是一种理念学说，而且成为实践的指针。又如，真兴王创设了花郎制度，而在 652 年又发生了加耶叛乱事件，他亲自派大将前往征讨，花郎裨将斯多含自请打先锋，当时年仅十五、六岁，随之而来的花郎徒有 1000 多人，最后斯多含壮烈牺牲。在他生前与武官郎结为知己，他宣誓虽不能同生，但要同死，死时年方十七。从斯多含的精神中，可以看到真心爱国和对亲友的笃厚信义。换句话说，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修己和安民的儒家伦理实践的具体体现。他既和武官郎结成难友，那么，在生前必然是以深厚的知己关系来共享友情，而这一友情无疑又是以人格化的互信为基础的。早期中国故事的管仲之交，管仲为鲍叔牙之死而悲痛，传曰：“士为知己者死”。当时在新罗



花郎之间，完全表现出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友情。

另一例亦可看出儒教的政治理念对当时新罗所产生的指导作用：高僧圆光（531—630年）曾为花郎讲解“世俗五戒”即：

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

授教者叫贵山和帚项，当百济军队大举入侵时（601年）他们一起从军，担任少监职务，在战斗中，贵山说：“士当军无退，岂敢奔北乎？”于是，走向前列冲锋陷阵；战况逆转，在新罗发动总攻时取得胜利。但是，这两个勇士却因负伤严重，最后在凯旋声中牺牲了。这种情况说明由儒学的忠孝发展起来变为护国精神。

我们再看一例，年代大概是真平王13年（552年）或者是真平王34年（612年），有两个年轻人共同宣誓，把誓文录刻石上，这就是《壬申誓记石》。原文如下：

壬申年，六月十六日，二人并誓记，天前誓，自三年以后，忠道执持，过失无誓。若此事失，天大罪得誓，若国不安，大乱世，可容行誓之。

又先别辛未年，七月二十二日，大誓，诗尚书礼传，伦得，誓三年。

由此可见，两个主人公向苍天宣誓，以修学问持忠道来为国家献身。他们在壬申年的前一年辛未年，就立誓用三年时间学习《诗经》、《书经》、《礼记》及《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这也可看出当时新罗青年学习的热情和立足于儒教的自律精神。并由此可推断当时新罗社会已经普遍学习这些经典了。

通过儒家经典在社会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可见一般。事实上，儒教作为东方的儒学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起过推动社会进程、发展文明事业的巨大作用。在韩国具有代表性的实例还可举出真平王（579—632年）时的金后稷的例子来说明：

金后稷曾作兵部令的官职，他见到当时的国王疏忽政事，一直热衷于狩猎，于是直谏国王。他直谏君主迅速恢复德政，为了使其认识到田猎会使人心放荡，对外又可引起亡国的忧患，引用《老子》和《尚书》的话来进言，即：

《老子》十二章所言：“驰骋田猎，令人心狂。”

《尚书》说：“内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但是，王沉溺于游乐之中。后来，金后稷患病，在临终时唤来三个儿子说，自己作为国家大臣不能纠正国王不良之处，担心国家会亡的，我即使死也要提醒君主。你们在我死后将我的遗骨葬在大王狩猎的路上。据说，他的遗嘱终使国王反省，停止了狩猎，专心致志地去处理国事。金后稷的这一故事表示了生死一贯的忠君爱国的精神，从另一侧面不难了解儒学理论产生了新罗护国的风气。在韩国历史上的三国统一决战阵地上，人们表示的爱国行为，团结一致，不怕牺牲，浑然一体，率先为国贡献的精神，正是立足于儒学的实践。又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即新罗钦春将军的儿子盘屈和盘屈的儿子金令胤的动人事实。在太宗武烈王七年（660年）当新罗和百济在黄山平野展开最后决战时，百济投入总兵力对抗，形势对新罗不利，钦春将军将一起参战的儿子盘屈叫来说：“为臣莫若忠，为子莫若孝，见危致命，忠孝双全”。对此，盘屈毫不犹豫，在战斗中牺牲。而盘屈的儿子金令胤在三国统一后的神文王当时，遇到尚在出没于高句丽的战败军，他对着他们说：“临阵无勇，礼经之所讥，有进无退，士卒之常分也，丈夫临事自决，何必从众”，于是在奋力战斗中殉国。这里讲的“见危致命”，是《论语》讲的；“临阵无勇”是《礼记》中的讽刺语，这又与世俗五戒中的“临战无退”是一致的。

上面一些例子说明儒教在新罗当时深入到人们思想中去。其深入的程度，普及的广度是自然分明不过了。

为了扩大儒学，神文王时（682年）新罗仿唐制设立国学，《三国史记》载，其教授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就是说，不让学生一人全部读完儒家经典，而是根据情况学习其中数种。或以《周易》、《礼记》、《论语》、《孝经》，或以《春秋左传》、《毛诗》、《论语》、《孝经》，或以《尚书》、《论语》、《孝经》、《文选》教授之。除了文选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以外，其他都是儒家经典著作。新罗王十分重视国学与太学的教育，曾多次亲临学校视察，了解贵族子弟的学习情况。

新罗神文王在位时期（681-692年），新罗著名学者薛聪在推动新罗人士学习儒家经典方面尤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创作了“吏读”，为一般士人阅读汉文的儒家经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由于克服了文字与语法上的障碍，更加有利于儒学在新罗的传播。

另外，新罗不仅设立了国学与太学这些高等学府，直接向王公贵族子弟传授儒学，而且设立了读书三品出身法，类似唐朝的科举制。其后直接设立了科举制度，达千年之久。读书三品，其中读《春秋左氏传》、《礼记》、《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品；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品；读《曲礼》、《孝经》者则为下品。若皆通五经、诸子百家书者，被视为奇才，可以“超擢用之”。学完之后经考试，按照读书优劣分别定为三品出身，授于官职。“学而优则仕”，这也体现了孔子的教育思想。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新罗时期来唐朝留学形成热潮。新罗为学习儒学，派遣各类人员到唐的都城长安，直接进入唐朝的国学与太学。当时国学与太学为了多吸收外国学子进学，学府不断扩大，由于新罗、高句丽、百济等诸国纷纷派遣其子弟进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唐太宗大力扩充国学与太学，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来唐留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还有一种是派遣子弟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的一种形式。国王、大臣子弟来唐宿卫，安排在国学就读。例如，金仁问是太宗武烈王的次子，“幼儿就学，多读儒家之书，兼涉庄老，浮屠之说”。他一生“七入大唐，在朝宿卫，计月日凡二十二年”。原来金仁问的父亲金春秋曾入唐研究国学，观讲论之后向唐太宗表示：“臣有七子，愿使圣明不离宿卫。”后来他即王位后，先让长子文汪入唐宿卫，又让次子金仁问宿卫。金仁问在唐二十多年，最后卒于长安。新罗名将金庾信也要求其子入唐宿卫。由于史籍缺载，新罗派到中国的留学人员具体数字无法统计。但来唐留学人员之多是历史空前的。

在这一批留学人员中，儒学家辈出，新罗几位儒学大家可推强首、薛聪、崔致远，此外，还有崔承祐、崔承等学者。例如，

强首（638-692年）：是统一新罗前后时期的政坛活跃人物，他经历三个朝代进出于朝廷，作为有能力的学者，特别是作为杰出的文笔家为新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自幼聪明过人，一天，他的父亲问，你是学佛教呢，还是学儒教呢？他说：

闻之，佛世外教也，愚人间人，安用学佛焉，愿学儒者之道。

其父同意儿子的意见，他最后选择了儒教。从强首婚姻上也可看出对儒学的敬仰。他年轻时和比他身分低的工匠女儿结婚，到他二十岁时已成名，父亲问他，你将微贱的女子作为终身伴侣，岂不感到羞愧吗？同时还劝他找一个容貌与品行双全的女子再婚。对此，

他拒绝了父母的意见：

强首再拜曰：“贫且贱，非所羞也，学道而不行之，诚所羞也。尝闻古人之言曰，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忘，则贱妾所不可忍者也。”

由此可以看出强首是儒教理论的实践主义者。由于他文笔卓越，在朝廷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唐朝传来的国书有难解之处，太宗武烈王均召他来解释。国王向唐复文时让强首主笔，由于文章出众，善解王意，强首得到重用，其所撰的外交文书均获得效应，邀请唐派兵的重要文书都出自强首之手，当时在新罗甚至在中国均给予很高评价。儒学的理论和实践二者的知行合一精神，始终是强首坚守的。

薛聪（655？-740年？）：是新罗著明的儒学代表，也是著明的汉学家。他以方言解读九经，训导后生。所谓方言解九经，即指发明用汉字标音或注明韩国语语法来帮助通读中国经典，为在新罗学习儒学书籍找到变通办法。新罗国学创立于神文王二年，可以推定他和强首一道参与了国学的创设。薛聪的文章虽是六朝、初唐的骈俪文体，但内容又属儒教范畴，他的文章出类拔萃，在说明儒家德治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崔致远（857-950年）：是统一新罗时期代表的儒家学者。他十二岁留唐，在中国科举及第，从事官职，文名威震，后归国活动。崔致远决心来唐时，他的父亲跟他说，如十年不能科举及第，我就不认为子，以此来激奋其努力读书。由于牢记父亲嘱咐，一心倾注于学业上，十八岁第一次科举及第，当时正好发生黄巢叛乱，他制讨黄巢檄文，对争取民心取得成功。他在唐作官十年，二十八岁（885年）旅居唐朝十六年后回到新罗，著有《桂苑笔耕集》，留下许多诗文，回国后作过殿中侍御史，当是新罗留唐学子中的佼佼者。

他的《秋夜雨中》：“秋风唯苦吟，世路少知音，窗外三更雨，灯前万里心。”也说明他的爱国、思乡的热忱。在他的作品中有不少佳作被收入到《全唐诗》中。

### （3）新罗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与运用

儒家思想不象佛家思想把希望寄托于来世而有些消极等待，也不象道家思想主张事物顺其自然。它是以人为中心，立足于现实社会，富有积极进取精神。它的“仁政”、“忠孝”、“礼义”等学说，维护了家庭和社会的秩序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那么，新罗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与运用，应该说既有深度又有广度。

1、儒家的仁政学说，是反对虐暴统治的。主张“节用而爱人”，儒家的仁学是它的核心，旨在缓和阶级矛盾，在新罗当时情况下实行仁政学说，有利于社会安定，特别是统一新罗后则更需要这一思想指导全局，于是，终成为王者的施政思想。

2、礼仪制度，在儒家思想中，实际上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它在新罗已得到普及应用。这对维护国家的安定，中央权力的集中，都起过重要作用。此外，它们也是“恪守周礼而行事”的，在儒家思想制约下，上下均不越礼而行之，“礼仪之邦”、“君子之国”由此而蕴生，为世人所赞誉。可见儒家思想在新罗普及以后，根深蒂固地存在并发展下去。

3、忠孝思想，是儒家倡导的人伦关系，强调事君以忠，事亲以孝，实际上二者又是一致的。这种观念对统一新罗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决不可缺少的。因此，新罗在传播忠孝思想上作得深入而广泛。它们不仅在发展儒教理论上作出贡献，而且使发源于中国的儒教哲学更加世界化，身教言教，在它们的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儒学博大的精神真髓。

4、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

信。儒家的这些思想有着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在新罗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姓，无不打上深深的烙印。

总之，儒学在新罗广泛传播，并且在新罗国土上扎根，辗转补充，开花结果，使儒教在东方得到发展。当儒学被融合到韩国民族文化中以后，实际上已成为韩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韩国、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同属儒学文化圈，这说明东方诸国文化上的共性。它为加深相互理解，密切合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二、佛教在韩国的传播

佛教传入韩国其次序是高句丽、百济、新罗。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即公元 372 年，“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立太学教育子弟。”

这就是说在 372 年算是佛教正式传入韩国。在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在这时候传入佛教？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笃信佛教，在佛教早期传入汉地后，到五胡的一族前秦时期，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前秦为了邀请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甚至发兵征服西域一个国家来接应罗什来汉地。后来释道安至中原，佛经译经事业从此大张旗鼓地展开，同时，前秦从早期已经开凿了敦煌的石窟，佛教传播十分兴盛，而前秦与高句丽又结成友好的关系，因此，将佛像与佛经作为国礼送给高句丽。高句丽当即设立佛寺肖古寺（省古寺）来接待汉地来的高僧。

佛教传入百济较高句丽晚五十年。当时百济使臣自晋回国时约请胡僧摩罗难陀一同到百济，百济王“迎致宫中礼敬焉，佛法始于此”。

新罗的佛教传入则更晚一些，大约晚于高句丽一百年。前两国佛教如果说是通过外交途径传入的话，那么，新罗则不同。称作墨胡子的高僧自高句丽潜入新罗，私住在毛礼家，在那里焚香供佛，当时人甚至连焚香作何用都不得知。到佛教逐渐传开后，发生了异次顿殉教事件。异次顿是新罗的王族，劝国王接纳佛教，但他的周围大臣不允，多持异议，最后异次顿为说服君臣而勇敢殉教。他临死时说，“为法就刑，佛若有神，吾死必有异事”，并对国王说：“杀身成人，乃人臣大节，况佛日恒明，皇图愈永，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异次顿殉教事，对佛教在新罗的传播有深刻的意义。说明后来的新罗对佛教的理解，要比其它两国更深。高句丽接受佛教后的几十年无大发展，而该地高僧们又纷纷外出辽东、新罗，甚至远走日本，如，惠能即成为日本奈良佛教的始祖。异次顿的生死观，是作为布施的精神，即大乘中“舍”的精神而被描写的。后来又发生了法兴王及其王妃削发为僧尼的事情，并为兴佛大兴土木，修建大王兴轮寺就是一例。

佛教传入新罗后又和土俗信仰结合在一起，对自然神的崇拜和敬畏即表明这一点。另外，新罗人的求道的精神特别旺盛，从求道、求法的精神来看，大大超过了高句丽和百济。在 6、7 世纪，求法前往中国的人载入《高僧传》中的有三十人，其中大部分人经过十年以上漫长岁月，逗留在中国求道求法。从佛教文化来看，他们无疑是韩中文化交流另一翼的使者。在新罗及后来的高僧中有卓越贡献的是圆光、圆测、元晓、金乔觉、义湘、义天、知讷、均如等。

圆光：是佛教传入新罗后，最初诞生的最卓越、最能正确理解佛教的先驱。他研究《摄论》，讲解《般若经》，研究如来藏思想卓有成就。他的“世俗五戒”，调动了新罗青年组织——花郎道的修炼积极性，为研究佛学指出了方向。

圆测：入唐以后成为唐玄奘最优秀的高足，他在佛教经典研究上自成一派，在他的门下尚有许多新罗弟子，当时，新罗派僧人成为在唐的重要流派，在他晚年要归国时，则天武后认为他佛法精深，一再挽留，未能回国，最后入寂于中国，与窥基同葬于玄奘两侧。

元晓：佛教著书实为丰富，涉猎佛经很广，统计著书有98种之多。他为《华严经》、《涅槃经》、《楞伽经》、《金光明经》、《金刚般若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无量义经》、《大乘起信论》、《成唯识论》、《瑜伽经》等大量佛典注疏。佛教有教判史，最早的、唯一的韩国人就是元晓。他主张和诤思想，认为各种教派都是出自大小乘，对中国佛教宗派上的分歧解决曾给予很大影响，在法藏的注疏中，大量引用了元晓的思想。他也成为海东严华宗、法相宗的始祖。

义湘：真平王42年（625年）诞生于新罗贵族家庭。自小出家成为皇福寺沙门，后同元晓一起赴华求法未成功，第二次，于文武王元年（661年）如其所愿来唐留学。他来到终南山至相寺探访华严大家智俨作为门下，在该处研习教学，得到恩师印证，学名远扬。文武王11年（671年）归国，得到朝廷的帮助，当年，于太白山下创建浮石寺，弘扬华严佛法。义湘著书颇丰，亦是华严的始祖，78岁圆寂，在韩国来讲他和元晓两人是首屈一指的一代高僧，为佛教在韩国的存在和发展，也为通过佛教，韩中两国进行交流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里，我们还应提到的是新罗僧金乔觉，唐时来到我国江南池州府九子山（今九华山），修道学法，对佛学有相当深的造诣。乔觉圆寂后，尸体置于石函之中，传说三年肉身不腐，人称地藏。由于他所处的唐代末期社会动乱，人们希望依托佛意度过难关，因此，经过金乔觉坚苦的努力，在九华山设立寺院，讲经说法，终于使南方的佛教盛行一时。今天，九华山佛教寺院成为中国的重要文化遗产，应归劳于这位国际的佛教高僧，人们不会忘记韩中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史话。韩国高僧慧超，象玄奘赴天竺一样也回游印度，著有《往五天竺国传》，他不仅是优秀的旅行家，而且是在佛教史上和东方交流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梁启超在佛论中说，敦煌发现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乃是中国佛学界的一大盛事。

佛教，博大精深，涉及问题有哲学问题、有历史评估问题、又有教派教义和发展民族文化所起作用的问题。这里，拟再就以下几个问题略加分析。

### （一）中韩佛教交流的历史背景

上面已经谈到佛教东渐的大体路径和情况。那么，在中韩两国佛教交流的历史背景中，又可以看到些什么呢？

原来韩国古代的固有宗教是信奉多神的，例如，自然崇拜、祖上崇拜，还有固有的巫术和北方民族的萨满教。因此，对当时来说，佛教不仅是先进的宗教，而且佛教内含有先进的文化。那时，中国正处于南北朝后期，佛教兴盛，统治阶级又把佛教作为维护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所需要的思想体系，这给新罗以极大的启发。出于团结国民，巩固统治，统一三国诸种功利主义的考虑，从6世纪30年代后，新罗支配阶级大力推行佛法。国王亲自皈依佛门，王妃削发为尼以为表率，使尊佛崇佛之风很快深延到新罗全境。在这

一时期，新罗倡导信仰弥勒，告戒人们不在来世，旨在现世培养国家的骨干人才，有力地巩固了新罗的统治，使佛教成为新罗的国教。

那么，这一时期新罗联合唐王朝先后攻灭百济与高句丽，统一了大同江以南地区，开始全面引进中国的先进制度与文化，成为当时的亚州第二强国。在日益扩大的官方与民间交流活动中，佛教文化占了相当的比重。至今的韩国各地留下无数佛教圣地，庆尚道庆州的佛国寺、石窟庵、芬皇寺，全罗道的金山寺、来苏寺、松广寺，釜山的通度寺，辉煌灿烂，闪烁着一颗颗东方明珠。新罗接受汉地佛教要比作为异质文化的印度佛教更容易被了解与吸收。那么，来华求法求道的人，大体始于东晋，终于北宋末叶，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其中最盛的阶段有300余年。新罗佛教人士来华直接参加了中国的佛教建设，他们苦心孤诣翻译佛经，撰写论述，为弘扬佛法义理作出了贡献。象圆光、义湘、圆测、金乔觉成了新罗佛学界一代宗师。新罗僧侣为丰富中国的佛教理论与实践，为佛教进一步中国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实在是功不可灭。

新罗僧人所以能起到如此重大作用，与唐朝的对外关系也有一定的联系。唐朝国势日强，对外政策的开放和宽容，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对外国策为新罗僧侣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 （二）新罗僧侣对唐代佛教研究的贡献

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传入我国后，到隋唐时期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从此，佛教具有中国化的特征，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新罗僧人求法正是在这一高潮阶段。因此，他们的贡献也最为显著。

翻译佛学经典是最大的历史工程，中国的译经活动在世界翻译史上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新罗僧人在这一伟大的文化活动中也倾注了心血和智慧。参加翻译的新罗僧人有圆测、神昉、智仁、胜庄、玄范、无著、慧超、慧日等。在玄奘、义净、地婆罗河、实叉难陀、菩提流志等主持的译经场中就有新罗僧人参加，而且担任证文、笔授、缀文等重要职务。据《宋高僧传》载，圆测助天竺僧菩提流志译《宝雨经》10卷，助实叉难陀译《八十华严经》，最后译事未终而卒于译所。由此可见新罗佛教人士对中国发展佛教所作的贡献。

中国对佛教教义的研究，到了唐代也已转入深化发展的阶段。而韩国的佛教理论的发展给中国佛教教理研究带来新鲜的气息。在这一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是元晓、圆测、顺憬等。元晓主张“会三归一”，主张“和诤”，用以调和、折衷各宗派的对立相争，强调一乘佛思想，为新罗统一三国提供了佛学理论。他的《十门和诤论》、《起信论疏》很受中国华严宗学者的推崇，说明中韩两国佛教交流，内含着互相补充，教学相长的精神，历史上两国佛学家，为在东方厚土开拓特殊的佛教哲学而献出无上的精力。也为蕴育东方民族所特有的文化而作出努力。

## 三、关于道教的交流

道教作为中国产生的教理有着极长的历史。先秦时期，号称“诸子百家”，但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流派，不过孔、孟、老、庄四家。诸子百家中，影响最深的是孔、老两家。从

孔、老两种思想体系来看，一般认为，一个系统尚刚，主动、贵有；这是《易传》开创的，《易传》是儒家的经典，因此，刚健一派占了优势。一个系统是尚柔，主静，贵无，这是老子开创的。孔子所创造的儒学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已被公认，而老子所创造的道学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为人注意不够。中国历史上，从秦汉以后，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政权，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权又管辖着广大分散的农村地区，这样格局延续两千余年，那么，从意识形态来讲，一般儒家偏重于在朝，道家偏重于在野。即所谓的在朝讲孔孟，在野讲老庄。道教和儒教实际上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不可缺少的两种思想体系，而矛盾的统一，又使这两种思想体系并存，相辅相成；如果二者协调的好，即是太平盛世，如果这二者协调不好，历史上常可看到引起国家不稳、社会不安。因此，这两大流派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也是为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

那么，道教和儒教一样，何时传入韩国不详。一般认为在民间很早传入高句丽。正式记载有渊盖苏文建议国王接纳道教的事实。盖苏文告王曰：“三教鼎立，缺一不可，请遣使至唐，求道教以训国人，大王深然之。”高句丽于是派使臣前往，“唐太宗遣道士叔达等八人兼赐老子《道德经》，王喜，取僧寺馆之”。

这就是道教传入韩国最早的记录。这里所指的道教与后代演变的五斗米教或仙丹炼金术有区别。它是指老庄无为自然之道。高句丽已经看到在治国平天下中，儒、释、道作为思想的理念是缺一不可的。儒教和道教代表的刚柔结合，互为所用乃制定国策所应遵循的原理，从盖苏文请求下谕求道教以训国人中可以窥视一斑。但高句丽也正是处理刚柔调和的关系上有所失误，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而新罗最终取得成功。后来，新罗统一了三国。

道教在唐朝受到重视，唐玄宗热衷于道教，在统一新罗时，唐又给予大力支援，并在文化方面给予很大影响。于是，在公元738年派高官邢琇携《道德经》送与与新罗王。玄宗嘱咐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关中国。去到那里为之讲解，使之知道大国道教、儒教的盛行。

唐玄宗择人来新罗，已经考虑到新罗为君子之国，对儒道深有理解，因此，要求去者善于讲解。前面我们谈到新罗花郎道的学习和修炼方式，根据崔致远的记录，老庄学说也包括在内的。“相唐以道义，相悦游乐，游娱山水”，这里有着道家浓厚的色彩。

韩国古代有一个百结先生的故事：百结先生极度贫寒，甚至连上下顿饭都不能相接，但他常常弹琴自慰，消除喜怒悲伤，邻居传来了捣米声，他对妻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它找到你，你不可拒绝，它要离开你，你也无法追赶。何必悲伤，我为之作捣米声来安慰你。这就说明道教“自宽自乐”的人生哲学，在封建社会人们是以此人生观作为牢固的信念而一直活下去，它亦反映了新罗知识层对道教的理解。而道教的思想对处于国家最高统治阶层来说，无为而治，常常是为战乱的复苏、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延续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或韩国文化，道教对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儒、释、道三者是中韩同质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韩国在固有思想和文化基础上，又融合儒、释、道，形成具有特色的韩国文化，使这一文化瑰宝充实到世界文化宝库中去。

## 四、汉字的传入与发展

当我们谈了儒、释、道作为思想体系在韩国文化中所产生的影响时，自然要谈到汉字问题。文字是构成一种文化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今天在上世界上存在五大文化圈，这就是汉字文化圈、印度字母文化圈、阿拉伯字母文化圈、斯拉夫字母文化圈和拉丁字母文化圈；而汉字文化圈在东亚，故形成东亚文化圈。那么，韩国作为东方的文明古国，使用汉字历史悠久，又用汉字谱写了自己的文明历史。本来韩国语与汉语非同一系统的语言，近代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将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语言作了历史的划分，一般认为韩国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但至今无定论，对一个不同系属的语言接纳另一系属的文字，自然会遇到困难。而韩国却对汉字的接纳，并为适应自己的语言，亦可谓潜注心血。现代韩国语词汇中由固有词和汉字词加上少量的外来语组成，一般来说，汉字词要占韩国语词汇的二分之一以上。由于两种词汇有机的结合，互为补充，使韩国语成为世界丰富语言之一。1443年世宗创造性地制造并颁发《训民正音》，从此韩国语有了极富科学性的杰出文字，用固有词和汉字词合璧的韩国语创造出的《龙飞御天歌》、《月印千江之曲》、郑澈的《松江歌辞》成为千古绝唱；韩国的文学名著《春香传》、《沈清传》的出现，还有用韩国语翻译出版的《杜诗谚解》、以及中国文学历史名著译本的陆续面世，为中韩文化交流锦上添花。

在发明韩国的民族文字以前，韩国的书而语言均为汉文，历史上诞生了李奎报、金富弼、一然、崔致远、薛聪、强首、成三问、金笠、李退溪、朴趾源等一代宗师和汉学大家，不能不说是韩国民族的骄傲！至于用汉文写成付梓的《高丽八万大藏经》、浩翰的《李朝实录》和儒家、佛家经典更是世界文化宝库中艳丽的奇葩。

汉字，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数千年来始终担当着中韩两国交流的友谊桥梁。而韩国民族结合自己的特点，又以汉字深化了本民族的文化，大大丰富了东方文化的内涵。在今天，中韩两国将为未来共同谱写友谊的新篇章，那么，两国人民历史积累的博大的精神财富和根深叶茂的同质文化，必将使两国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用东方文化蕴存的精神共铸辉煌！

## 五、中韩文化交流若干特征

在我们简略地叙述了中韩历史文化交流后，不得不联想到在这一历史的文化交流中存在着不少特点。

### 1、中韩文化本质相近，但又有相异

由于两国同属东方文明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历史发展的进程相似，互相接触得又频繁，于是造成文化上的同质性。我们说它相异，又不觉得是截然不同，这就说明两国的各自文化有不同的基础。那么，在各自的文化基础上，又受到同一种思想体系和文化现象的影响，从而使这两种文化有了内在的联系。汉文化如果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建的话，那么，韩国文化，是继承韩国先古民族文化遗产，又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发展而来的。



以儒学为主流的文化，对我们两国文化注入新鲜的内容，而且使它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中韩两国为共同建造东方文化，为人类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文化的同质，又把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使两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得以共同交融。

## 2、韩国在接纳外来文化上，善于选择，有所取舍

翻阅韩国的历史篇章，使我们感到韩国在接纳外来文化上包容性很强。举凡儒教的，道教的，佛教的，它都可以融化而为我所用。例如，前曾举出的花郎道的思想体系，就是包容三教，能将儒、释、道融合在韩国固有的“风流道”中去。新罗在接纳佛教时，最后能使佛教更加升华，造成“佛国土”，象今日的庆州，昔日乃是佛教文化在东方的璀璨瑰宝。至于不适合韩国国情或民情的一切流派，都要经过取舍，例如，蒙古兵入侵，元朝的进入，韩国并未接受喇嘛教，而仍以传统的汉地佛教作为主教。五斗米教的道教也未能代替正统的道教。韩国接受程朱理学，但其中一些消极的东西并不接受。

## 3、韩国接纳精神文化，富于实践行动

韩国不论接受儒教还是接受佛教，一旦形成自己的理念，就不尚空谈，贵在实践。历史上有多少重大举措，都是在这一理念规范下坚决实行的。刊行八万大藏经巨大的工程，是在佛教思想深入人心情况下实现的。至于历史上出现的名家重臣，仁人志士所建有的历史不朽的功勋，也都体现了理念付诸实践的精神。

## 4、接纳外来事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里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事例说明韩国接受外来事物后，常常是不断创新，不断提高而达到更高境界的。中国发明印刷术后，韩国继创造铜活字后，又创造了铅字。在韩国影响下，中国也于15世纪采用了铜活字印书。有名的武英殿聚珍版即是如此。高丽青瓷，大概受到宋越窑、汝窑的影响，但在韩国却制造出世界驰名的青瓷。庆州的石窟庵的开发，就结构的几何原理，佛体婀娜多姿的线条，从美学观点来看是开凿石窟的精美作品。这些，不愧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 5、韩国重在继承民族文化遗产

韩国人民千百年来创造了宝贵的民族文化，建立了为韩国民族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尊重、发扬民族文化遗产上态度十分积极。笔者亲自感到在今日的韩国，西方文化虽有影响，但不是全盘接受。而韩国对自己的文化却十分推崇和爱戴。教育方面来看，有以传播儒学等人文科学为主的成均馆大学，有以讲授佛学为主的东国大学，至于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各种学术团体则象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并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另一方面来看，韩国家庭中的父慈子孝，学校中的尊师重道，社会上的约束规范都引人注目。每年兴办的宗庙的祭礼、成均馆的祭孔、释迦诞生的佛典都各具特色，对保护所行的古礼实为可贵。全国的文化史迹地管理有序，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十分强烈，历史名人的故居、国家重点文物、重要自然景观、古刹旧庵、出土遗址都保护得十分完好。韩国的旅游，专题专项，“热爱故土”、“体会民俗”、“学习历史”名目甚多。重要文化场所定期为群众举办“讲座”、“研习”、“修炼”等活动。韩国在一个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社会，能够宣扬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在人们珍爱文化热忱的氛围中，韩国才可以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民族精神。

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是源远流长的。经过漫长的岁月紧密相处，在文化和思想上相互启迪，相互补充，相互推动，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化，在文化交流史上，两国的密切